

第三卷 南 宋

枫窗小牍

袁 聚

(生卒年)

袁聚(生卒年不详),崇宁(1102—1106年)至嘉泰(1201—1204年)间人。原居汴京(今开封),后迁临安(今杭州)山中。著有《枫窗小牍》,题“百岁老人”撰。

《枫窗小牍》二卷,《四库全书》收于子部小说家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其“所记多汴京故事,如艮岳、京城、河渠、官阙、户口之类,多可与史传相参,其是非亦皆平允。”

陈善《扞虱新话》谓:“非意到目见,不知其妙。”袁聚遭时乱离,所言“感时花溅泪”“非虚语”,正复此意;苏轼解相国寺反新法诗谜,盖亦与其政见有关。六朝人(西山令,平五明)撰聚入选文字据《说库》本。

一、题相国寺壁诗

荆公柄国时,有人题相国寺壁云:“终岁荒芜湖浦焦,贫女戴笠落柘条。阿依去家京洛远,惊心寇盗来攻剽。”人皆以为夫出妇忧荒乱也。及荆公罢相,子瞻召还,诸公饮苏寺中,以此诗问之。苏曰:“于贫女句,可以得其人矣。终岁,十二月也,十二月为青字。荒芜,田有草也,草田为苗字。湖浦焦,去水也,水旁去为法字。女戴笠为安字。柘落木条剩石字。阿依是吴言,合言为误字。去家京洛为国,寇盗为贼民。盖言青苗法,安石误国贼民

也。”(《宋纪》九十六)

二、感时花溅泪

鸡冠花，汴中谓之洗手花。中元节前，儿童唱卖，以供祖先。今来山中，此花满庭，有高及丈余者。每遥念坟墓，涕泣潸然，乃知杜少陵“感时花溅泪”非虚语也。

(田树生)

岁寒堂诗话

张戒

张戒(生卒年不详)，南宋初人。《仪顾堂题跋》卷十三谓戒为绛郡(即正平，今山西)人。宣和六年(1124年)进士，绍兴五年(1135年)授国子监丞。后因随赵鼎反对和议而被贬。其事附见《宋史·赵鼎传》。著有《岁寒堂诗话》。

《岁寒堂诗话》二卷，《四库全书》收于集部诗文评类。

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、马星翼《东泉诗话》、张宗泰《跋〈岁寒堂诗话〉》、林昌彝《海天琴思录》都对《岁寒堂诗话》作了高度评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是书“通论古今诗人，由宋苏轼、黄庭坚上溯汉、魏、《风》、《骚》，分为五等。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，始明言志之义，而终之以无邪之旨，可谓不诡乎正者”。张戒论及古今诗人，认为“诗妙于子建，成于李杜，而坏于苏黄”。对苏轼的“以议论为诗”和黄庭坚的“补缀奇字”，“冶容太甚”首先正面提出反对意见，

并尖锐指出苏黄的“用事押韵”，乃“诗人中一害”。只有使“苏黄习气净尽”，方可以论唐人诗。其时，苏黄正被奉为诗坛圭臬，在此情况下，张戒对苏黄习气提出批评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张戒以儒家正统的文艺思想为准，倡导儒家诗教，重情志而归于无邪。以韵味微婉，“正而有礼”为上，以不识“风雅之旨”为下。他强调诗以“言志为本”，也不排斥“咏物”，但反对“专意于咏物”。“言志”与“咏物”当兼而有之，但“言志乃诗人之本意，咏物特诗人之余事”。而咏物者要先得其“格致、韵味”，才能得其“实录”之“形似”。咏物要能“近物情”，则必先观察、体验。他所说的“兴则触景而得”，即诗人之志，素所蓄积，见“目前之景，适与意会”，发而为诗。从而通过咏物而言志，反对为咏物而咏物。要做到“情真”、“味长”、“气胜”。正因为此，他提出“诗人之工，特在一时情味，所以不能事先‘预设法式’”。而“世间一切皆诗”，诗人随遇而吟，也就是说“诗尽人间兴”，“吟多意有余”。诗文只要“从胸臆中出”，便是好诗。

张戒所推重《国风》的是“词婉”、“意微”、“不迫不露”，从而主张艺术表现要含蓄、蕴藉，反对“浅露”；提倡古朴自然的诗风，反对单纯追求“用事押韵”的形式主义诗风。作诗当能“情在词外，状溢目前”，必须是“情意有余，汹涌而后发”，做到“不迫不露”，含蓄天成。

关于如何学习前人的问题，他提出“其始也学之，其终也岂能过之”，要与李杜争衡，就必须上溯汉、魏、《风》、《骚》。否则，“屋下架屋，愈见其小”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提出“立志须高”、“取法乎上”的思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张戒的重情志而归于无邪的诗论，为沈德潜的“格调说”开了先声。

黄荅“入选文字据无锡丁氏校刊本《历代诗话续编》。

一、情真味长气胜

建安、陶、阮以前诗，专以言志；潘、陆以后诗，专以咏物。兼而有之者，李杜也。言志乃诗人之本意，咏物特诗人之余事。古诗、苏、李、曹、刘、陶、阮，本不期于咏物，而咏物之工，卓然天成，不可复及。其情真，其味长，其气胜，视三百篇几于无愧，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。潘、陆以后，专意咏物，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，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。谢康乐“池塘生春草”，颜延之“明月照积雪”，谢玄晖“澄江静如练”，江文通“日暮碧云合”，王籍“鸟鸣山更幽”，谢真“风定花犹落”，柳恽“亭皋木叶下”，何逊“夜雨滴空阶”，就其一篇之中，稍免雕镌，粗足意味，便称佳句，然比之陶、阮以前苏、李、古诗、曹、刘之作，九牛一毛也。大抵句中若无意味，譬之山无烟云，春无草树，岂复可观。阮嗣宗诗，专以意胜；陶渊明诗，专以味胜；曹子建诗，专以韵胜；杜子美诗，专以气胜。然意可学也，味亦可学也。若夫韵有高下，气有强弱，则不可强矣。此韩退之之文，曹子建、杜子美之诗，后世所以莫能及也。（卷上，下同）

二、杜诗高古莫及

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，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，非粗俗，乃高古之极也。自曹、刘死，至今一千年，惟子美一人能之。中间鲍照虽有此作，然仅称俊快，未至高古。元、白、张籍、王建乐府，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，然其词浅近，其气卑弱。至于卢仝，……乃信口乱道，不足言诗也。近世苏、黄亦喜用俗语，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，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。子美之诗，颜鲁

公之书，雄姿杰出，千古独步，可仰而不可及耳。

三、诗人分五等

国朝诸人诗为一等，唐人诗为一等，六朝诗为一等，陶、阮、建安七子、两汉为一等，《风》、《骚》为一等。学者须以次参究，盈科而后进，可也。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，子瞻自言学陶渊明，二人好恶，已自不同。鲁直学子美，但得其格律耳。子瞻则又专称渊明，且曰：曹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诸子皆不及也。夫鲍照不及则有之，若子建、李、杜之诗，亦何愧于渊明？即渊明之诗，妙在有味耳，而子建诗，微婉之情，洒落之韵，抑扬顿挫之气，固不可以优劣论也。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，此乃不易之论。至于李杜，尤不可轻议。欧阳公喜太白诗，乃称其“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，玉山自倒非人推”之句，此等句虽奇逸，然则太白诗中，特其浅浅者。鲁直云：“太白诗与汉魏乐府争衡”，此语乃真知太白者。……退之于李杜但极口推尊，而未尝优劣，此乃公论也。子美诗奄有古今，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，然后知子美用意处，识汉魏诗，然后知子美遣词处。……人才高下，自有分限，然亦在所习，不可不谨。其始也学之，其终也岂能过之。屋下架屋，愈见其小，后有作者出，必欲与李杜争衡，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。

四、咏物为工言志为本

诗以用事为博，始于颜光禄，而极于杜子美。以押韵为工，始于韩退之，而极于苏、黄。然诗者，志之所在也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岂专意于咏物哉！子建“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徘徊”，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，非以咏月也，而后人咏月之句，虽

182733

极其工巧，终莫能及。渊明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，非以咏田园，而后人咏田园之句，虽极其工巧，终莫能及。故曰：“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；长言之不足，故咏叹之；咏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”后人所谓含不尽之意者，此也。用事押韵，何足道哉！苏、黄用事押韵之工，至矣尽矣，然究其实，乃诗人中一害。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，而不知咏物之为工，言志之为本也。风雅自此扫地矣。

五、韵味才力意气

韵有不可及者，曹子建是也；味有不可及者，渊明是也；才力有不可及者，李太白、韩退之是也；意气有不可及者，杜子美是也。文章古今迥然不同，钟嵘《诗品》以古诗第一，子建次之，此论诚然。观子建“明月照高楼”、“高台多悲风”、“南国有佳人”、“惊风飘白日”、“谒帝承明庐”等篇，音节铿锵抑扬，态度温润清和，金声而玉振之，辞不迫切，而意已独至，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，此所谓韵不可及也。渊明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、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此景物虽在目前，而非至闲至静之中，则不能到，此味不可及也。杜子美、李太白、韩退之三人，才力俱不可及，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，太白多天仙之词，退之犹可学，太白不可及也。至于杜子美，则又不然，气吞曹、刘，固无与为敌。如放归鄜州而云：“维时遭艰虞，朝野少暇日，顾惭恩私被，诏许归蓬荜”；新婚戍边而云：“勿为新婚念，努力事戎行。……罗襦不复施，对君洗红妆”；《壮游》云：“两宫各警蹕，万里遥相望”；《洗兵马》云：“鹤驾通宵凤辇备，鸡鸣问寝龙楼晓”；凡此皆微而婉，正而有礼。

六、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

“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”，以“萧萧”、“悠悠”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，宛在目前。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，乃中的之为工也。诗人之工，特在一时情味，固不可预设法式也。

七、诗以词婉意微为贵

《国风》云：“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”“瞻望弗及，伫立以泣。”其词婉，其意微，不迫不露，此其所以可贵也。……杜牧之云：“多情却是总无情，惟觉尊前笑不成。”意非不佳，然而词意浅露，略无余蕴。元、白、张籍，其病正在此，只知道得人心事，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。

八、辞不迫切意已独至

陶渊明云：“世间有乔松，于今定何闻。”此则初出于无意。曹子建云：“虚无求列仙，松子久吾欺。”此语虽甚工，而意乃怨怒。古诗云：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”可谓辞不迫切，而意已独至也。

九、意在律前乃可名古诗

世人作篆字，不除隶体，作古诗不免律句，要须意在律前，乃可名古诗耳。

十、情意须有余

《国风》、《离骚》固不论，自汉魏以来，诗妙于子建，成于李、杜，而坏于苏、黄。……子瞻以议论作诗，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，学者未得其所长，而先得其所短，诗人之意扫地矣。段师教康昆仑

琵琶，且遭不近乐器十余年，忘其故态，学诗亦然。苏、黄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唐人诗；唐人声律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六朝诗；镌刻之习气净尽，始可以论曹、刘、李、杜诗。《诗序》云：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。”子建、李、杜皆情意有余，汹涌而后发者也。刘勰云：“因情造文，不为文造情。”若他人之诗，皆为文造情耳。沈约云：“相如工为形似之言，二班长于情理之说。”刘勰云：“情在词外曰隐，状溢目前曰秀。”梅圣俞云：“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，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。”三人之论，其实一也。

十一、情意不可太详景物不可太露

梅圣俞云：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”，元微之云：“道得人心事中事”，此固白乐天长处。然情意失于太详，景物失于太露，遂成浅近，略无余蕴，此其所短处。

十二、诗文须从胸臆中出

诗文字画，大抵从胸臆中出，子美笃于忠义，深于经术，故其诗雄而正。李太白喜任侠，喜神仙，故其诗豪而逸。退之文章侍从，故其诗文有廊庙气。

十三、评韩柳

柳柳州诗，字字如珠玉，精则精矣，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。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，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。意味可学，而才气则不可强也。

十四、评王韦

韦苏州诗，韵高而气清；王右丞诗，格老而味长。虽皆五言之宗匠，然互有得失，不无优劣。以标韵观之，右丞远不逮苏州；至于词不迫切而味甚长，虽苏州亦所不及也。

十五、诗 格

世言白少傅诗格卑，虽诚有之，然亦不可不察也。元、白、张籍诗，皆自陶、阮中出，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，本不应格卑。但其词伤于太烦，其意伤于太尽，遂成冗长卑陋尔。比之吴融、韩偓俳优之词，号为格卑，则有间矣。若收敛其词，而少加含蓄，其意味岂复可及也。

十六、诗文当以文体为先

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，警策为后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，则“枫落吴江冷”，岂足以定优劣。

十七、韵度与意味笔力与气格

韦苏州律诗似古，刘随州古诗似律，大抵下李、杜、韩退之一等，便不能兼。随州诗，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，意味不能如王摩诘、孟浩然之胜绝；然其笔力豪赡，气格老成，则皆过之，与杜子美并时，其得意处，子美之匹亚也。长城之目，盖不徒然。

十八、不露筋骨

世以王摩诘律诗配子美，古诗配太白。盖摩诘古诗能道人心

中事，而不露筋骨，律诗至佳丽而老成。

十九、中晚唐人诗各有短长

张司业诗与元、白一律，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。但白才多而意切，张思深而语精，元体轻而词躁尔。籍律诗虽有味而少文，远不逮李义山、刘梦得、杜牧之。然籍之乐府，诸人未必能也。李义山、刘梦得、杜牧之三人，笔力不能相上下，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，七言尤工，五言微弱，虽有佳句，然不能如韦、柳、王、孟之高致也。义山多奇趣，梦得有高韵，牧之专事华藻，此其优劣耳。

二十、以不识风雅之旨为下

庭筠语皆新巧，初似可喜，而其意无礼，其格至卑，其筋骨浅露，与牧之诗不可同年而语也。……庭筠岂识风雅之旨也。

二十一、意味可爱

陶渊明云：“迢迢百尺楼，分明望四荒。暮则归云宅，朝为飞鸟堂。”此语初若小儿戏弄不经意者，然殊有意味可爱。

二十二、各得其一偏

(李)贺有太白之语，而无太白之韵。元、白、张籍以意为主，而失于少文；贺以词为主，而失于少理。各得其偏，故曰：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

二十三、承袭

韩退之之文，得欧公而后发明；陆宣公之议论，陶渊明、柳

子厚之诗，得东坡而后发明；子美之诗，得山谷而后发明；后世复有扬子云，必爱之矣。诚然诚然。……余问：“鲁直得子美之髓乎？”自……居仁沈吟久之曰：“子美诗有可学者，有不可学者。”余曰：“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。”

二十四、学前人须得其意

。也作粗俗语仿杜子美，作破律句仿黄鲁直，皆初机尔。必欲入室升堂，非得其意则不可。

和陆二十五，世间一切皆诗十二

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，而不知拙语亦诗也；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，而不知常语亦诗也。欧阳公诗，专以快意为主；苏端明诗，专以刻意为工。李义山诗，只知有金玉龙凤；杜牧之之诗，只知有绮罗脂粉；李长吉诗，只知有花草蜂蝶；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。惟杜子美则不然，在山林则山林，在廊庙则廊庙；遇巧则巧，遇拙则拙，遇奇则奇，遇俗则俗；或放或收，或新或旧，一切物，一切事，一切意，无非诗者。故曰：“吟多意有余。”又曰：“诗尽人间兴。”诚哉是言！

二十六、思无邪

孔子曰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。”世儒解释终不了，余尝观古今诗人，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。……孔子删诗，取其思无邪者而已。自建安七子、六朝、有唐及近世诸人，思无邪者，惟陶渊明、杜子美耳，余皆不免落邪思也。

二十七、无意而意已至

山谷云：“诗句不啻空强作，对景而生，便自佳。”山谷之言，诚是也。然此乃众人所同耳。惟杜子美则不然，对景亦可，不对景亦可。喜怒哀乐，不择所遇，一发于诗；盖出口成诗，非作诗也。观此诗闻捷书之作，其喜气乃可掬。……山谷晚作《大雅堂记》，谓子美诗好处，正在无意而意已至，若此诗是也。（卷下，下同）

二十八、咏物当先得其格致韵味

《江头五咏》，物类虽同，格韵不等。同是花也，而梅花与桃李异观；同是鸟也，而鹰隼与燕雀殊科。咏物者要当得其格致韵味，下得其形似，各相称耳。杜子美多大言，然咏丁香、丽春、栀子、鸂鶒、花鸭，字字实录而已，盖此意也。

二十九、观物才能近物情

《屏迹》二首，“用拙存吾道”，若用巧，则吾道不存矣。心迹双清，纵白首而不厌也。子美用意如此，岂特诗人而已哉！“桑麻深雨露，燕雀半生成”，此子美观物之句也。若非幽居，岂能近此物情乎？妙哉，造化春工，尽于此矣！

三十、兴则触景而得

《晴》：“啼鸦争引子，鸣鹤不归林，下食遭泥去，高飞恨久阴。”子美之志可见矣。“下食遭泥去”，则固穷之节；“高飞恨久阴”，则避乱之急也。子美之志，其素所蓄积如此，而目前之景，适与意会，偶然发于诗声，“六义”中所谓兴也。兴则触景而得，此乃取

物。第一野，会柳曹家杖笏，相象更前折案新履未南出暮晚，折全
“燕芭中雪”杖笏卧。前形更青长醉上赏知最折由（张宝坤）“文
后咏歌等来实真朱芭，垂醉朱芭从醉不，实更民实后竟更朱芭的
。前更前折杖笏等便受景醉自更，折

猗觉寮杂记

燕芭里雪，一

云燕惠站。燕芭中雪成。朱翌，将入画熊王：云刻平
芭，雪大参，马曲成代袖。燕中雪非燕芭以雪。暑寒犬燕芭里雪”
朱翌（1097—1167年），字新仲，号潜山居士，舒州（今属安
徽）人。南宋时官至中书舍人。著有《潜山集》。《猗觉寮杂记》六卷，四百三十五条。《四库全书》收于子部杂
家类，以前三卷为上卷，后三卷为下卷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是书“上卷皆诗话，止于考证典据，
而不评文字之工拙；下卷杂论文章，兼及史事。”又评曰：其书虽
有牵强穿凿之处，“然其引据精凿者，不可殚数。在宋人说部中不
失为《容斋随笔》之亚。”《猗觉寮杂记》的论诗倾向，可从它对诗人用事、用典、用意
的大量考据中见出。朱翌认为，“古今以诗名世者，用字未尝无所
出。”由这个观点出发，朱翌对唐宋名家逐一指出用事、用典实例，
并称赞黄庭坚用字“有来历”，用前人句而益工。可见，其诗论观
点与江西诗派有一定联系。

同时，朱翌以考据的方法指出杜诗“真诗史也”；又以诗歌的
发展变化而观“世道”；又考证韩愈《赴江陵途中》的现实内容。这
些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问题，是有意义的。
《猗觉寮杂记》在解释杜甫“竹花不结实”诗句时，比较顾及

全诗；解释杜甫未赋海棠诗的现象时，反对穿凿附会，“撰一说以文之”。这些见解在诗歌欣赏上确是有见识的。但他对“雪中芭蕉”的艺术现象认定为写实，不能从艺术特征、艺术真实来考虑和认识，这自然是受到考据方法的影响。

入选文字据《学海类编》本。

一、雪里芭蕉

平谈云：“王维画入神，不拘四时，如雪中芭蕉。”故惠洪云：“雪里芭蕉失寒暑。”皆以芭蕉非雪中物。岭外如曲江，冬大雪，芭蕉自若，红蕉方开花。知前辈虽画亦不苟。洪作诗时未到岭外，存中亦未知也。（卷一，下同）

二、退之写民苦

《唐新史》以退之自监察御史极论宫市，德宗怒，贬阳山令，皇甫湜为退之神道碑云：“贞元十九年，关中旱饥，人死相枕藉。而吏刻取息。先生列言天下根本，民急如是，请宽民徭，免田租之弊。专政者恶之，斥为阳山令。”退之《赴江陵途中诗》云：“是岁京师旱，田亩少所收。”云云；“传闻闾里间，赤子弃沟渠，持男易斗粟，掉头莫肯售。吾时出衢路，饿者何其稠。”云云；“适余除御史，诚当得言秋。拜疏移闻门，为忠宁自谋？”又云：“僂僂不回顾，行行诣连州。”则因论旱贬阳山无疑。不知史何据而云论宫市。

三、以诗观世道

唐人诗多自用名及呼人名与第行，皆情实也。杜云：“甫昔少年日”，“白也诗无敌”，退之云：“愈昔从事大梁下”，“籍也陇头陇”之类。今皆不然，不特不自呼其名，若呼人名则必取大怨怒。世